

新作品

杨绛



父亲的村庄

邓宗良

小时候生活的小镇在雷州半岛东海岸。海滩的远处,长在淤泥里的红树林,像刻意躲避着人类的打扰。红树林后边,淤泥渐渐变干变硬,上面爬满低矮、粗糙、坚硬的野草。海水的浸泡和烈日暴晒,使发灰的野草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像快要枯死,但它们生生不息,呵护着缓缓抬升的坡地,来到了岸边。开阔的潮间带古朴而苍凉。涨潮时,灰绿色的海水淹没了红树林,近处的几棵木麻黄树潮满时依然探出树梢,毫不窘迫,淡然自在地看着潮水退去。土坡在风和浪日夜拍打下,早已坍塌,形成长长的岸崖,裸露的黄土面向大海敞开纯朴的心扉。

沿着海岸向南走,也就是三十里,海岸被一条黏土垒成的大海堤接替,由它来抵挡汹涌的潮水。海堤内,有父亲小时候生活的村子;海堤外,也是一片潮间带,似乎更广阔,木麻黄树也多了一些。那里的潮间带,埋着我陌生的爷爷和奶奶。

很小的时候,清明节回去给爷爷奶奶扫墓,不明白为什么村子的人把坟墓修在潮间带。潮起潮落,哪来的土人为安?那里有惊涛骇浪,那里也有似疾风而下的箭头的大暴雨。

上小学那一年,我们回到父亲的村子住了几个月。这是一段抹不掉的记忆。借住的是一个刚建好的小院子,简陋的一排三间房,泥巴稻草混合的土块砌墙,稻草屋顶。雨点打在屋顶上无声音,泥坯墙渗入外面的潮气。风雨肆虐着屋顶的稻草,后来再读杜诗的“卷我屋上三重茅”便颇有心得。小院子里,与三间房相对的是一个来不及填平的小池塘,入夜后那里的蛙声更加高亢,与田间的蛙声响成一片。呱呱的蛙声直到叫灭了村子的灯火,才歇息下来。借着这寂静,薄雾悄悄地聚拢到村子,轻柔地搭在一排排低矮的茅草屋上。雾中的月光更朦胧,轻抚着酣睡的村子。夜里,半睡半醒中,隐约听见屋子角落传来老鼠咀嚼或磨牙的声响,细碎而温柔。

村子在雷州东岸,“东”是方位,“洋”是洋田,平原般广袤的稻田。那里土地肥沃,是雷州半岛的粮仓。番薯很大,一刀切开,浓稠的汁液瞬间渗出,让人想到这是洋田永不枯竭的乳汁。洋田间,清亮的水渠纵横交错。村子出口有一条水渠直指雷州城,看上去是通向三元塔脚下。水渠边有压实的土路。夕阳余晖从九层高的三元塔顶洒过来,暮色中的小水渠像无边碧绿稻田里一条藏不住的晃眼的金丝带。

清晨,村口水渠上,几条舢板大小的小船满载着稻谷、番薯的沉甸甸的麻袋、竹筐,船底蹭着水下滑溜的淤泥,被纤绳拉着,滑向雷州城。渠小,船小,没有帆,更没有发动机,伴着拉纤人的脚步节奏,小船荡起渠边的浪花。日落时分,小船载着各种与生计、耕作有关的物

黄昏,我坐在花果山社区的一处天井里,一边等待熬汤鱼,一边抬头看四角的天空。

相比起北疆大写意的空,花果山的天空是逼仄的,魔幻的,仿佛一脚踏入另外一个星球。人走在几乎将天空与青山一口吞没的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之间,有瞬间变成一只渺小蚂蚁的错觉。一切都巨大无比,荒蛮推进,所有高楼都如钢架,冷硬地插入大地。群山在楼宇的轰鸣中,惊退几千米,为人类让路。这迷宫一样繁复的世界,让人晕眩。一只鸟在此盘旋了一天,才发现自己迷失在花果山。

这是夏日,凉爽的风化作游蛇,流进高楼大厦的缝隙之中。天井里忙碌的人们,偶尔会像青蛙一样抬起头,在湿润的风里发一会儿呆。更多的時候,近百万人在苹果园社区二百多栋摩天大楼中间,化作尘埃,埋头忙碌。

正如此刻,小酒馆的女人一边驱赶着苍蝇,一边忙着为我们做一盆麻辣爽口的酸汤鱼。她有一张俊俏的脸,嗓音清亮,站在天井里喊了一声,三十层高楼上俯瞰的人都会被她吸引,心琢磨着,要不晚饭也来一盆鱼鲜肉嫩的酸汤鱼?她的丈夫同样充满活力,有长年日头晒出的黧黑肤色。晚饭的高峰期已

品,坐着一两个脚力不好的老奶奶,慢慢悠悠地从城里返回。不时有迎娶或送嫁的人群,簇拥着坐着新娘的小船,兴头十足地走进或走出村子,水渠忽然五彩缤纷,声声吹奏,热气腾腾。

更小的沟渠贴着田埂,水流很缓。无风的清晨,雾气沾在小水渠上,久久不肯散去。快到冬天,水渠边依然青草翠绿,小小的黄花洒落其间。小小的鹅群压低长长的脖颈,吃着嫩草,高亢而沙哑的叫声融入了薄雾。鹅仔小小的叫声短促又柔软,好像就缠在母鸡脚掌上。它们在鹅群里钻出钻入,像一个个明黄色的绒球滚来滚去。村子里好像每家每户都养鹅,串门时很伙它们。鹅伸直又长又硬的脖子,借着有力拍打的巨大翅膀,横冲直撞,无所畏惧,凶狠的架势毫不逊色于看家护院的黄狗儿。小巷常常被长时间的降雨泡成烂泥浆,鹅稀粥般的排泄物混入里面,难以下脚。村子里的人们赤脚行走,习以为常。更难的是小巷异常滑溜,初来乍到的人一个跟头足以狼狈不堪。老人喜欢脚蹬一种用小麻绳套住的厚木屐,防滑又清爽。套上这种网履走路,很是需要技巧,非一日之功。

村子的中心位置人气最旺,因为那里有一口水井,或许说是一个出水口更为准确。水从泉眼噗噗地涌出,冲出地面,流进上面一个石砌的方形大水池。如果不是池子齐腰高的位置有个龙头,让水哗啦啦地长流,池子里的水早就溢出了。人们用各种水桶接上龙头吐出的水,挑回家里。踩着石块掂脚探头一看,水池里长满嫩青苔又像水草一样的绿柱,比水池外壁的苔藓长许多,随水的晃动而轻轻地摇摆。水有点咸味,村子里的人们却说是可口的甜水。人们满足和陶醉于大自然的馈赠,豁达,舒心,快乐。

从村子东端上了大海堤,回头看,这是一个大村子。村子应该是修建了海堤才形成的,也许这里是一处小的冲积平原,但没有发现河流,更像是开阔的潮间带,先人筑起海堤从大海那里夺得了一隅生存空间。村子祠堂对子里有中原、闽南的字样,告诉后人,这是一个移民村庄。先人从中原经闽南来到雷州半岛时,此地可能已无良田可耕,这是一个传奇,多少艰辛、挫折、悲壮、血泪,只有我们的先辈才知道。边远荒芜之地,世代耕耘,终于成为今天富庶的鱼米之乡,我们古老民族在岭南地区生存、融合、繁衍的拼图中,这一块虽小却是不可或缺的。

这里的节日因此更敬重逝去的长辈,不管什么节日,祭祖必不可少。清明节甚至比春节更重要,更有内涵。似乎这是一个家族的一种大团聚,健在的子子孙孙和故去的先人,以富有仪式感的方式对话、告白、检验、祈愿和嘱咐。故去的人们,不会占用后人的耕地,长眠于海堤外的潮间带,是他们生前心安理得的选

择。海堤朝村子的一面,零零落落放着一些逝者的棺木,看上去很有年头的了。那是因为有人舍不得亲人入土的地方不时被潮水淹没,但也不去占用一寸耕地,当然那时还没提倡火葬。

海堤之内,长风吹过,金色稻浪涌向天边。绿树掩映的父亲的村庄,还有远处的村庄,有如几个小小的岛屿。微风吹动着那里的袅袅炊烟。天还没有暗,星星就迫不及待地蹦了出来。瓦蓝夜空洒下的月光,落在海堤顶小小的土路上,泛着象牙白,走动的影子是赶海归来的独行人。

父亲未满10岁时,爷爷奶奶先后永远离开了。我没见过爷爷奶奶,他们没有留下一张照片。从我懂事那天起,特别是看到小玩伴的爷爷奶奶,总是想象爷爷奶奶他们到底长什么模样。我想,他们与包括父亲在内的父亲村庄的老人,肯定有几分相像。

父亲村庄的老人,劳作一生,干瘦有劲的腰杆子像船上的桅杆那样笔直,行走在田埂、海滩、泥泞小巷上,脚底生风,从不拖泥带水,轻快而柔韧。他们老去的脸膛,紧绷着黑黝黝的粗厚皮肤,言语有些粗俗,却直截了当,趣味盎然,鲜活闪亮。没有人松松垮垮、疲疲沓沓,没有人常年卧床不起、臃肿歪歪地活着。或者劳作,或者死去。到了时辰,他们会说出一生中最平静最宽慰的一句话:“把我放在厅间,让我寿终正寝。”记忆中,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都像阳光下的浪花那样明亮,因为他们的心是明亮的。

那里的人们,总是长年累月地默默劳作,没有叹息,没有抱怨。秋收时,没有喇叭喧嚷,没有彩旗飘飘。那时没有收割机,人们一声不吭地弯腰挥镰割稻。田野里跟之前一样安静,人们偶尔站起来伸伸有点僵硬发酸的腰。他们的身后,割下来的金灿灿的稻穗,齐齐整整地平放在黑亮的土地上。风中传来成熟稻穗粗涩而燥热的气息,孩子们这才发出一声透着新奇和自豪的感叹,禁不住张开小嘴喃喃自语:“哦,稻熟了。”农时是最可靠和熟悉的计时和历法,人们总能记住谁家后生是春播时生的,谁家奶奶是夏收时死的。一切故事都与土地和耕作有关。人,土地,岁月,揉成了一团。节日,红白喜事,有敞开心扉的狂笑,有天崩地裂的号哭。雷州的哭嫁和哭丧掏心掏肺,悲欣离合像风一样,来了又走了。刚刚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来了,用哭得红肿的眼睛,看一眼睡梦中的婴儿,破晓时分下地干活了。男人用一生的积蓄,给死去的老母亲买一副最好的棺木,然后再一分一分地去挣钱。

父亲村庄的先人,跟许许多多从北面迁徙来到这里的人一样,或许就是从潮间带踏上这片热土的,又从这里潮间带离去,留下的是血脉和灵魂。于是,这里成了我们的故土。

我也曾多次听老谢小亨唱过他在行军途中自编自唱过的一首“进行曲”。多少年来,这首歌给了他无穷的信念和力量。老谢是湖北省民间文艺界出了名的“机智人物”。这得益于他三十多年的民间文化的濡染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湖北各地市的群艺馆和县文化馆,都接下了采集民间文学“三大集成”的任务。“三大集成”分别是民间故事集成、民间歌谣集成、民间谚语集成。

我当时在与嘉鱼县同属咸宁地区的(后来划归了黄石市)阳新县文化馆工作,自然也全力参与了阳新县“三大集成”的采集和编辑工作。老谢当时是嘉鱼县文化馆副馆长,当嘉鱼县民间文学“三大集成”的主编任务落到了他肩上时,他已是年逾花甲的人了。但他像一个老兵接到了上级命令一样,二话没说,打起背包就下乡去了。

我记得那些年里,有好几次,我去嘉鱼看他,有如“松下问童子”,“云深不知处”一样,文化馆里的人,谁也不知他是在哪一带“打游击”,很难找到他。有一次,好不容易找到了老谢。他给我讲了一些他的趣事,我记忆犹深。

东吴古镇陆溪口,有位民间老艺人叫杨鹏。老谢常常和他结伴采风。两人凑在一起,一对“半瞎子”,两个“老顽童”。夜里走路,一根绳子上拴着两人,活像“耍猴儿”。有一天采风归来,天色已晚,老谢想要赶回县城去。杨鹏劝阻说:“回去还不是光棍一条?黑灯瞎火,明天再走吧!”杨鹏说的是事实,老谢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,却一直是单身汉。他说:“约好了今晚有作者来谈稿子的。”杨鹏只好拱手相送。

两个老顽童在夜晚布满泥泞的田埂上边走边谈,兴之所至,禁不住手舞足蹈。但乐极生悲,老谢一步踩空,整个人摔进了水沟里,眼镜没了,头部也摔伤了。杨鹏急得大声喊叫

孤独。贫穷如影随形,日日将我嘲笑,拉到众人前鞭打、拷问。许多个春天,万物散发勃勃生机,小小的我在翻滚的麦浪中穿行,却希望有一片汪洋能将自己立刻吞噬,而那些日夜将我折磨的痛苦与恐惧,也会随之终结。可是,人生如此漫长,痛苦也一路跟随,从未休止。我这样走过很多年,终于远离故土,一路北上,与父母相隔千里。

我究竟是如何蒲公英一样远离故土的呢?我常常想不明白。就像我也不明白,在我吃下的无数的餐饭中,为何独独是这一次与朋友相聚在没有鲜花和果实的花果园,就着米饭,吃下一盆美味的酸汤鱼,并喝下一杯啤酒?

想不明白,也不再去想。鱼已经吃完,空空荡荡的盆里,只剩下完好无损的鱼骨,在稀薄的鱼汤中,用一片茫然的眼睛,注视着天井上方的一片夜色。那里,正有一颗星星,穿越几光年的距离,散发出稀薄的光。

饭后,走至一片完全由高楼圈起的空中露台,坐在台阶上,看人们穿梭来往。商贩们早已高高挂起了灯盏,白炽灯下晃动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。早晨还在兜售包子和米粥的小店,到了夜晚,转卖水果。饱满多汁的西瓜,三下五除二就被店主削了皮,切成小块,分到透明的

平庸的肉体,也滋养着我们蠢蠢欲动的灵魂。

一盆酸汤鱼充盈了我们的肠胃,也打开了彼此的心。朋友说起自己的母亲,刚刚做完心脏手术,眼看着风烛残年,人生的时日不多。感觉一阵风来,生命的火焰就会随时熄灭。在此之前,朋友从未想过生离死别,以为我们会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,以为今日结束,会有无数个明日抵达。是母亲一颗被损到需要修补的心,让朋友忽然意识到来与去,生与死,都只是短暂的一程。母亲每日为家人忙碌的一日三餐,也终会在不久的将来戛然而止,成为永不复返的过去。

我也聊起自己的童年。因为父母无休无止的争吵逃出家门,无家可归时的

很多年没去鄂南嘉鱼县了。前不久,省作家协会安排去嘉鱼采风,我首先想到的就是,这一次,应该有机会看一看多年未见的一位老朋友、老前辈、民间文艺专家谢志告先生了。不料,一到嘉鱼,县政协的同志就告诉我,谢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。得知这个消息,我在心里难过了好些日子。

有一个动人的画面,常常在我脑海浮现:狭窄的斗室里,一盏小小的台灯下,数叠高耸的稿件夹缝中,一位满头华发的孤身老人,正躬着背脊,全神贯注地校阅着一篇篇稿件。190度宛如酒瓶底般的镜片,几乎是贴在稿纸上了。铁划银钩、字斟句酌、一丝不苟……这番情景,也让人想到巴乌斯托夫斯基笔下那位每天都从手工作坊的飞尘中,收集和淘寻出一粒粒金色粉末,并最终用这些积攒起来的金粉,铸成一朵闪光的金蔷薇,送给了一个穷人家的姑娘的沙梅老头……当夜色深沉,遥远的汽笛声隐隐送进这座靠近长江的小城的梦里的时候,沉浸在工作中的老人,仿佛从一个静谧的长梦中惊醒,从堆积如山的稿件中抬起头来,取下厚重的眼镜,使劲揉了揉酸痛的眼睛……谁能知道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,他像这样度过了多少个辛劳的夜晚?不用说,当他再次俯身来到那盏小小的台灯下时,窗外已传来鸡鸣声了。

这位深情而执着的老人,这位从朝鲜战场上走过来的志愿军老兵,这位从此以后孜孜不倦地从事着群众文化工作的“老文化战士”,就是常年居住在嘉鱼县的谢志告。我们那時候都称他为“老谢”。

诗人郭小川有一首名诗《秋日谈心》,写的是几位在战争年代里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,在新中国和平的日子里,在秋日的公园里,促膝谈心,回忆起战斗的青春时代的情景。其中写道:

大陈说:“那时候啊,我们也真一无所有,肩膀上只有一杆破枪,背袋里只有一把黑豆。”老侯说:“那年头啊,我们都是又黄又瘦,头顶上只有一堆乱发,脚杆上只有一片泥垢。”

大陈说:“那时候啊,我总是在夜行军中耍‘猴’,‘瞎子’看不见路,用根小绳拴在我的背上走。”老侯说:“那年头啊,老陈的肚皮大如斗,每次会餐时,至少要吃十五个四两重的馒头。”老谢作为志愿军战士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时,是一个“文艺兵”,是部队文工团的团员。那时候他的眼镜片就已经像酒瓶底一样厚了。他跟我讲过,有时候半夜里急行军,他看不清道路,就只好用一根小绳,把自己拴在前面的战友的背包带上。第一次听他讲到这个细节时,我顿时就想到了郭小川在诗中的描写,想象着当志愿军战士时的老谢,跟郭小川笔下的“老侯”真是一模一样。

“紧紧跟上队伍,一步也不落……”我也曾多次听老谢小亨唱过他在行军途中自编自唱过的一首“进行曲”。多少年来,这首歌给了他无穷的信念和力量。老谢是湖北省民间文艺界出了名的“机智人物”。这得益于他三十多年的民间文化的濡染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湖北各地市的群艺馆和县文化馆,都接下了采集民间文学“三大集成”的任务。“三大集成”分别是民间故事集成、民间歌谣集成、民间谚语集成。

我当时在与嘉鱼县同属咸宁地区的(后来划归了黄石市)阳新县文化馆工作,自然也全力参与了阳新县“三大集成”的采集和编辑工作。老谢当时是嘉鱼县文化馆副馆长,当嘉鱼县民间文学“三大集成”的主编任务落到了他肩上时,他已是年逾花甲的人了。但他像一个老兵接到了上级命令一样,二话没说,打起背包就下乡去了。

我记得那些年里,有好几次,我去嘉鱼看他,有如“松下问童子”,“云深不知处”一样,文化馆里的人,谁也不知他是在哪一带“打游击”,很难找到他。有一次,好不容易找到了老谢。他给我讲了一些他的趣事,我记忆犹深。

东吴古镇陆溪口,有位民间老艺人叫杨鹏。老谢常常和他结伴采风。两人凑在一起,一对“半瞎子”,两个“老顽童”。夜里走路,一根绳子上拴着两人,活像“耍猴儿”。有一天采风归来,天色已晚,老谢想要赶回县城去。杨鹏劝阻说:“回去还不是光棍一条?黑灯瞎火,明天再走吧!”杨鹏说的是事实,老谢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,却一直是单身汉。他说:“约好了今晚有作者来谈稿子的。”杨鹏只好拱手相送。

两个老顽童在夜晚布满泥泞的田埂上边走边谈,兴之所至,禁不住手舞足蹈。但乐极生悲,老谢一步踩空,整个人摔进了水沟里,眼镜没了,头部也摔伤了。杨鹏急得大声喊叫

孤独。贫穷如影随形,日日将我嘲笑,拉到众人前鞭打、拷问。许多个春天,万物散发勃勃生机,小小的我在翻滚的麦浪中穿行,却希望有一片汪洋能将自己立刻吞噬,而那些日夜将我折磨的痛苦与恐惧,也会随之终结。可是,人生如此漫长,痛苦也一路跟随,从未休止。我这样走过很多年,终于远离故土,一路北上,与父母相隔千里。

我究竟是如何蒲公英一样远离故土的呢?我常常想不明白。就像我也不明白,在我吃下的无数的餐饭中,为何独独是这一次与朋友相聚在没有鲜花和果实的花果园,就着米饭,吃下一盆美味的酸汤鱼,并喝下一杯啤酒?

想不明白,也不再去想。鱼已经吃完,空空荡荡的盆里,只剩下完好无损的鱼骨,在稀薄的鱼汤中,用一片茫然的眼睛,注视着天井上方的一片夜色。那里,正有一颗星星,穿越几光年的距离,散发出稀薄的光。

饭后,走至一片完全由高楼圈起的空中露台,坐在台阶上,看人们穿梭来往。商贩们早已高高挂起了灯盏,白炽灯下晃动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。早晨还在兜售包子和米粥的小店,到了夜晚,转卖水果。饱满多汁的西瓜,三下五除二就被店主削了皮,切成小块,分到透明的



怀念一位 志愿军老战士

徐鲁

着,摸索了半天,先摸到了一只棉鞋,然后才摸到满身泥浆、满脸是血的老谢。天寒地冻,夜色漆黑。杨鹏赶紧为老友包扎好伤口,老谢套上透湿的棉鞋,磕磕碰碰连夜步行了20多里,总算赶回了县城。

也正是这一次,他收集到了《长毛港》等几个很有价值的民间故事。同志们得知老谢受伤的消息,纷纷前来探望,老谢竟乐乐呵呵地说:“这有什么呢?打从抗美援朝起,我不就是这样泥里雪里,摸着滚着走过来的吗?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”

按说,快要迈入古稀之年的人了,又是孤身一人,应该坐下来享享清福了。可他偏不服老。有时开会见面,我问他:“尊体近来可好?”他眨巴着眼睛,似乎要唾出某种“潜台词”来,笑着说:“托福,托福,昨天没死,就意味着今天还好好活着。”

大半生的基层文化生涯,可谓阅人多矣,受人冷落、遭人白眼的境遇也委实不少。可他又常常为了事业而宠辱皆忘,乐此不疲。为了使三套民间文学集成早日出版,老谢可谓殚精竭虑。

他跟我讲,有一天,他半夜里睡不着,爬起来给当时的县委书记刘书记写了一封长信,诉出版经费的艰难。刘书记看完老谢恳切的长信,当即批了字,让财政局予以支持。刘书记还拿着他批了字的长信,对老谢说:“老谢,你眼睛不好使,我念给你听吧。”仅仅这一句话,就把老谢感动得眼眶里涌出了泪水。他拿着批示,恭恭敬敬地给刘书记鞠了一躬。

后来,当三大本厚厚实实、散发着墨香的新书送到全县各界的手上,老谢喜笑颜开。他说,捧着墨香扑鼻的新书,那些歌歌难眠的夜晚,那些鼻青脸肿的摔打,又算得了什么呢?老谢就是这样一个人,一大批年轻的文学作者已从他们编辑的文艺小报《蜜泉》上起飞,像山雀子一样飞向了全省和全国。不用说,老谢就是帮他们“打过背包”、扶过他们踏上“战马”的人。

这是一位老战士的华发雅歌,是一位“最可爱的人”的黄昏之献。这使我想到,一个人生命的魅力,也正如太阳的光辉,不仅在黎明时是绚丽多彩的,它在正午和黄昏,同样也喷射出迷人的光华。

写到这里,我不禁又想到了郭小川《秋日谈心》里的诗句:老刘说:“不,那时候,一列士兵就是一条铁流,所有难耐的艰辛呀,一律变成真正的享受!”老侯说:“对,那年头,一支队伍就是一副骨肉,所有小小的私怨呀,一律化为大大的公仇!”

大陈说:“那时候啊,就是废铁也不会生锈,一切的破屋断墙呀,都成了我们前进的斥候!”老刘说:“那年头啊,就是木棒也可以不朽,一切的奇峰怪石呀,都成了我们防身的甲冑!”

大陈说:“那时候啊,早把生死放在脑后,甘愿以血肉之躯,充当时代列车的轮轴!”老刘说:“那年头啊,对个人幸福无所追求,甘愿以全身骨骼,架设革命事业的高楼!”

忽然间,我们的诗人好像喝醉了葡萄酒,他说:“但愿每次回忆,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。”过了一会,我们的中校爽快地昂起了头,他说:“大海已经渡过,更何惧急湍的河流!”

